



新世纪学术专著丛书

文化范式

译学研究
与比较文学

傅勇林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文化范式：译学研究 with 比较文学

傅 勇 林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化范式: 译学研究/傅勇林著, 一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9

ISBN 7-81057-513-9

I. 文... II. 傅... III. ①文学 - 翻译 - 研究 - 中国
②比较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275 号

文化范式: 译学研究/比较文学

傅 勇 林 著

*

出 版 人 宋绍南

责任编辑 旷 琰

封面设计 肖 勤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交大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科电话: 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E-mail: cbs@center2.swjtu.edu.cn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 ~ 1000 册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7-513-9/I · 009

定价: 20.00 元 (平), 30.00 (精)

译学研究 with 比较文学的新成果

刘 象 愚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勇林的《文化范式：译学研究 with 比较文学》就要问世了，他嘱我写序，我不能辞，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与勇林的比较接近，没有理由不关注他的学术成果。我 60 年代初进大学读外国文学系的英美文学专业，1978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再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的近 20 年间，一直从事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文论和译学有比较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这些领域里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这些领域内的题目讲几句话大抵不至于天龙神鬼，汗漫无际，或者言不及义，妄下雌黄，以致遭致妄评乱议之讥。其二，我与勇林相交有年，对他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水平有一定的认识，由我来序他的论著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我初识勇林是 1993 年仲夏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会议的地点在湖南的张家界，在紧张的学术讨论之余，会议安排大家游山，勇林和我有较多的时候在一起走，我们边观赏湘西秀美的山水，边切磋读书心得，一路所谈的内容多半是我们双方都感兴趣的英美文学和翻译问题。勇林谈锋甚健，话题在语言、文学、文化间转来转去，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居然对当时还健在的几位著名的英美文学界前辈译作中的个别地方提出质疑。勇林在大学和硕士生阶段读的都是英文系，中英文的基础都相当不错，当时正在西南交通大学外文系教授英语和英国文学等课程。他勤奋好学，敏于思考，他

的质疑自然不无可商榷处，但他敢于指责名人专家的著译，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学术勇气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那次会议之后，我们时有书翰往来，后来又见过几次面，每次见面他都兴致勃勃地谈论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我知道，他曾参加《译林》组织的翻译大奖赛，并获了奖；他的论文发表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他还进一步攻取了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即将出版的这本《文化范式：译学研究比较文学》是他数年来刊发和未刊的一个文章的结集，是他在语言学、诗学、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结晶，这本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他学术生命的成熟。而今，当他在辛勤耕耘的学术园地上即将获得丰收的时节，作为对他的学术道路有所见证的老友，我感到格外欣喜，也乐于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勇林这本书讨论的译学，或曰译介学，是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尽管古今中外都不乏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但当代译学自有其不同以往的特色。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译学主要是指从文化层面对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它诞生于目前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异质文化交融共铸的大文化背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门学科正日渐汇入国际学术主流，并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深度推进起着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比较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研究自此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其间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比较文学的研究传统由于译介学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并试图从中获取它持续发展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这场范式变革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提高了这一学科的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境界。知识、思想、学术范式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自成高格”，为在新的世纪保持其在学术主流中的地位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当代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和学科整合。其目的是以跨文化的视野贯穿全局，并以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主线，重点进行中西译学的跨语际模式研究。这种研究既以文化模式为路径重返历史深度，又以多学科交相阐释以达其文化整合之目的，试图以综合手段，应和当代学术研究的涵摄品位，为比较文学研究别开生面、重铸学术内涵以及相应的学术范式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代译学还对以下问题进行重点研究：译学与诗学模式、译学与语言学范式、译学的文化整合范式、译学与考据学、译学与阐释学、译学与跨语际实践、译学范式的科学品质及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译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思想、学术和知识层面的反思、译学研究 with 比较文学共享价值的体现、译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知识的增长、译学与比较文学理论模式的多元发展、译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操作智慧的成熟及其规则体系的重建等。

当代译学研究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研究，虽然它也十分重视“史识”的理论寻绎，但绝不是翻译“史实”的历史勾勒。其重点在理论寻绎和范式建构，同时基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并辅以多学科的交叉穿合，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重“译理”，不重“译技”；虽然它并不无视“翻译技巧”对于跨语际文化传通的重要作用，但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它更重视“译技”对翻译实践在文化层面上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翻译中的范式转向缘于文化的整合渗透，同时又试图通过相应的研究为跨文化整合提供理论模子，这无疑是当代译学研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两点应该提及：一是它特别强调“跨文化语际研究”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体系，同时将其区别于传统的译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廓清了此前有关研究的理论误区；二是拈出“译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新范式”，以为跨文化语际研究及其理论建设的核心与关键，为译学研究和比较文学学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为理性的学理基础。

综观近 20 年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除学术体制化过程已经完成，学术成果累累，还可看出其学术肌理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的走向。过去出入于语际间、国际间和文化间的单向平面描写已逐渐为双向、乃至多向、立体的动态深层阐释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学术境界豁然开朗，基于深邃学术思想的学术洞见正穿透某些盲点而逼近理想的学术境界，催生出至为成熟的学术范式，为下一世纪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范式：译学研究 with 比较文学》在其第一部分中，介绍西方当代译学理论及其范式变革，重点探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以及比利时、荷兰、捷克学者的早期贡献、佐哈分层系统理论对译学研究的学理注入、图瑞对传统语言学及文化藩篱的范式超越、80 年代译学研究 with 文化整合范式的发展以及解构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译学范式变革的全新意义等理论问题。借助这些探讨，可以使读者了解西方当代译学研究及其范式变革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对中国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理论启示，对于时下的学术研究不无启迪。本书在其第二部分中引入文化范式机制，着重于学科之间的穿插交合，以西方当代语言学模式为理论轴心，做举隅研究，涉及文论模式、致思方式、词源、美学、中国传统小学、语用学、言行同一论、后结构与解构主义等诸方面。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以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的方式，进一步申论了译学研究的文化蕴涵。

本书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它将译学置于跨文化语际实践中，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诗学规律，并加以系统的比较观照，而这正是当前比较文学 with 文化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其研究途径为：在研究中时时考虑本学科与跨文化语际实践的整合，既注重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又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二是它努力做到引进而又能吸收融会。它清醒地意识到当代西方理论及其影响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因此，正如一位旅美学者最近所说，当

代西方理论“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和学科史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①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本书的重点就不是现在一般所谓的“西化”还是“民族化”之类的论辩，而是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索，诸如：比较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史的爬抉梳理能否落实在语际“互译性”之初、落实在语际之间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进程之中？如果比较文学本身即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其学科发展史是否亦是如此？基于这种“互译性”所诞生的比较文学又是如何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另外，这种“互译性”的特质如何？它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融共铸（甚至“误解”）产生过（或将要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它对西方文化这个“他者”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身认识又造成了怎样的历史性后果？其对文化本体论又提出了怎样的历史性挑战？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必然归结到探究文化范式、译学、比较文学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上。

香港学者孔慧怡（Eva Hung）在其新著《翻译·文学·文化》一书的《总序》中说：“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②力图从文化层面来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发掘中国译学传统中的精粹，探讨中国译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建构，以便对21世纪的译学和比较文学做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传统的独特贡献，无疑是作者

①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24页。

②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页。

为本书设定的一个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体现了时代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因而也具有了自己的学术价值。

自然，我们很难说，本书的探索已经获得了怎样的“突破”，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但它提出的问题、提供的思路、指出的路径却是新颖的、独特的，也是很有见地的、发人深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只是提出了问题，而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大问题，决非一人之力可致，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需要译学界与比较文学界专家学者的协作与持久努力。应该说，这是我们期待于学界同仁的，也是我们期待于像勇林这样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才俊的。

刘象愚 2000年8月于
北师大四书室

目 录

译学文化范式及译学研究

文化范式与翻译范式的形成	3
西方译学的范式变革：传统与演进	16
西方当代译学研究：文化整合范式的早期探索	22
西方译学：研究范式的文化整合	35
80年代的译学研究与文化整合范式的发展	53
译学范式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诘难	66
西方译学研究范式：现状与未来	73
中国译学范式：现状与未来	81

译学理论范式及译学研究

文论模式及诗歌翻译阐释	93
英汉互译：具象与抽象之间	107
词源、阐释与翻译	
——兼析王佐良先生译《西风颂》	117
复义、氛围及诗歌翻译	
——兼评《西风颂》的两个中文译本	124
语用意义与诗歌翻译	138
言行同一论在小说对话中的理解与翻译	146
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影视翻译新范式	155
英汉翻译的影响与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结构变异	
——从“机会”说开去	167

文化视野与比较文学

中印欧文化范型的确立及其意义与言说方式 的历史形成	191
西方理论预设与中国诗学文本的重组 ——《人间词话》与中西文论的交融	207
“以少总多”与中西诗学的双向熔铸与综摄	219
以少总多·尚象精神·诗性智慧 ——关于“比兴”说的一个理论评注	230
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经验论证与价值探索	252
考据学的传承与学术范式的更新	258
中英文学关系的交互投射与衍用	272
视域延伸与学科价值的多维凸现 ——评《比较文学与现代文艺学》	290
后 记	303

译学文化范式 及译学研究

文化范式与翻译范式的形成

文化范式与译学范式关系密切，可以说每一个译者或译学研究者都基于某个特定的文化范式而延伸出相应的译学范式并在其中从事文化创造活动。比如，倘若分别叫两位译家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中一位出自弗洛伊德门下，另一位来自存在主义学派，所得的译品毫无疑问将有天壤之别，而造成这种区别的关键就是因为有文化范式之别，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与存在主义学派之间的学术品质距离很大，二者显然不可以道里计，两位译家基于自身学术范式的模塑并以此预设翻译阐释、整合译作品格、赋予其不同的范式品质，自然就会演绎出不同的翻译范式，从而推出面貌迥异、品质各别的译品。

“范式”就其一般的理解是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自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很快便风行于科学哲学界，同时也为包括语言学、翻译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吸收采纳。1989年语言学家科尔勒缩小了“范式”的指涉范围，只用其指语言学史上堪称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传统语言观念的理论体系。科尔勒在这个意义上分别讨论了“施莱歇尔范式”、“索绪尔范式”和“乔姆斯基范式”，为语言学界重新进行颇有理论深度的学术反思提供了理论框架，曾引起广泛重视。在科学史上，早期天文学家群体的研究范式奠基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后来又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所替代，可见新旧范式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一场革命。在语言学界，“施莱歇尔范式”、“索绪尔范式”和“乔姆斯基范式”

此消彼长，均以各自堪称典范的成就促使一代代语言学家反思传统范式的功过得失，并为新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纵观中国文论发展史，类似的范式反思也时有所见。比如齐梁间刘勰“逆袭狂澜”，认为时人“竞今疏古，风味气衰”，究其缘由，盖因“文不宗经”，遂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拈出，视为规绳，其目的显然是要在“圆鉴区域，大判条例”进而重建话语规则、促进诗学话语意义的新质生成之前，先做一番文论范式的历史寻绎与反思，而其重点一在“文心”——探讨文论诸家共有的精神信念和价值信仰，一在“雕龙”——重构文论操作范式和规则体系，也颇得“范式”要旨，显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科学品位，因此朱东润先生谓之“深得文理”。但就现实而言，刘勰创辟的文论范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进行范式革命所具有的学术洞见，因为没有这种洞见便没有他对文化范式的宏观寻绎，也就没有文论范式的重构与建立，而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下进行译学范式的反思与重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译学研究大致与其翻译史同步，据可稽考的文献记载，自后汉明帝永平8年(公元65年)佛籍传入中国，迄今已走过了2000余年的历程。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安息国王子安世高“白马驮经”东来，开佛籍汉译之先河，其后译事大兴，译论迭出，曾为中华文明的递嬗演进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伴随着几次意义深远的译事高潮(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首启西域译事、两汉之际至元初逾1200年佛籍翻译大兴、明末清初实学翻译流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中叶西学东注、80年代西学文化典籍翻译热)，中国译学也在反思与求索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时值世纪之交，着眼于中国译学研究在下一个世纪的更大发展，似有必要在清理总结本世纪中国译学研究既有成绩的同时，也参考西方译学迄今(尤其是近20年)已取得的进展，并借此在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反思中国译学的现状与未来，以期在下一个世纪能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相对于时下遂为流弊的内省直觉、玄想意度以及译学非学术的信仰经验,在从事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之中,理应将“译学文化范式与译学研究”这个命题纳入学术视野,并移之与中西方并存的实证抑或践证精神相观照,共同构成现实译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和学理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译学研究,并使之深契于世界译学研究体系,为当代世界译学体系输送中国学者持久的关怀。

关于翻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梅纳德·迈克(Maynard Mack)曾经以文学翻译为例,从语言、文化和译者素养三个方面予以剖析定义,所引个案切合原旨,与人多有启迪。本文讨论译学的文化范式及其与译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关系,切入点不妨就从迈克教授所征引的荷马名著《伊里亚特》(*Iliad*)中的有关诗句开始。原文出自《伊里亚特》第六章,其时特洛伊城岌岌可危,Hector率军出城守卫,此时妻子 Andromache 与其见面,乞求退守城内,以免生命之虞。此处荷马用如下诗句开始了 Andromache 与丈夫之间的对话:“δαίμωνι ε, φθίσει σε τὸ σὸν μενος(daimonie, phthisei se to son menos).”迈克教授的讨论首先从宿语的词汇缺项现象开始,认为翻译表现在词汇的推敲断定上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选择,比如原文中的 μενος(menos)一词在希腊语中可指物(意为 force)、可指动物(意为 fierce, brute, strong)、也可指人(意为 passion, spirit, purpose)。荷马在这里遣用此词显然是各种意义兼而有之,主要并指 Hector 所具有的力拔盖世般的 force, strength, fierceness in battle, spirited heart and mind 等英雄气概与豪落气质。而如下历代英国译家囿于英语本身的词汇缺项(这种现象的产生实则缘由于英民族类似文化经验的缺失)却根据自身的文化预设和认知图式相继作出了如下的词汇选择:

(1) George Chapman (1598 年译):

O noblest in desire,

Thy **mind**, inflamed with others' good, will set thy self on fire.

(2) John Dryden (1693 年译):

Thy **dauntless heart** (which I foresees too late),
Too daring man, will urge thee to thy fate.

(3) Alexander Pope (1715 年译):

Too daring Prince...

For sure **such courage** length of life denies,
And thou must fall, thy virtue's sacrifice.

(4) William Cowper (1791 年译):

Thy own **great courage** will cut short thy days,
My noble Hector...

(5) Lang, Leaf, and Myers (1883 年译, 散文体):

Dear my lord, this thy **hardihood** will undo thee.

(6) A.T. Murray (1924 年译, 散文体):

Ah, my husband, this **prowess** of thine will be thy doom.

(7) E.V. Rieu (1950 年译, 散文体):

"Hector," she said, "you are possessed. This **bravery** of yours
will be your end."

(8) I. A. Richards (1950 年译, 散文体):

"Strange man," she said, "your **courage** will be your
destruction."

(9) Robert Fitzgerald (1976 年译):

Oh, my wild one, your **bravery** will be
Your own undoing!

从中可以看出, 源语词汇($\mu\epsilon\nu o s$, *menos*)植入宿语(*mind*, *dauntless heart*, *such courage*, *bravery*, *prowess*, *hardihood*)已被各家译者根据自身母语资源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所呈现的译文凝聚着宿语文化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是原文的一种“片面”的文化整饬, 可见翻译究其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母语文化经验所进